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6.024

# 钱锺书“化境说”定界、定位与定类

余承法<sup>1</sup>, 梁琪婉<sup>2</sup>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广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针对学界对钱锺书“化境说”的理解存在的分歧,采取文本细读、以钱解钱、比较对照、综合分析等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解读。时空定界上,“化境说”立足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多学科理论,是钱氏打通古今、中西、学科的思想结晶;功能定位上,“化境说”是普通级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专家级和大师级译者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范畴定类上,“化境说”是钱氏结合对林译现象的重评,由个人翻译实践提升而萌发的片段翻译思想,并非他刻意建构的系统翻译理论。“化境说”的“三定”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将钱氏翻译思想发扬光大,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钱锺书;“化境说”;定界;定位;定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6-0178-07

钱锺书“化境说”自提出60年来,一直被奉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和(或)标准,引发了持续不断的阐释、申发、评价和运用,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但存在“十多十少”的失衡现象<sup>①</sup>。这种失衡聚焦于以下“三不”:第一,时空定界不清,对“化境说”是中国本土的还是西方外来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第二,功能定位不准,对“化境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还是最高理想,存在较多分歧;第三,范畴定类不当,“化境说”属于翻译观(念)、思想或理论的讨论尚未达成一致。鉴于此,本文采取文本细读、以钱解钱、比较对照、矛盾相攻的方法,试图还原钱锺书提出“化境说”的历史场域,阐释其论著中的相关表述,澄清认识误区,弥合已有分歧,继承和发扬钱氏翻译思想,推动中国传统译论的现当代诠释。

## 一 “化境说”时空定界:本土还是外来? 传统还是现代?

对“化境说”的时空定界,主要是要辨明它在

中国译论发展史中的来源和位置:是中国本土还是西方外来,还是以本土为主、外来为辅?是传统还是现代,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甄别某种翻译学说或理论是否属于中国传统,可先从总体上采取时空划定:考虑它与古代、近代、现代等时间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在地缘意义上的国别和区域位置,但不以绝对的时空概念作为判断依据;然后综合考察“其在学缘上是否与国学传统存在因承性,以及在学理上是否与国学思想保持内在一致性”<sup>②</sup>。

### (一)“化境说”空间定界:中国本土还是西方外来

“化境说”是中国本土翻译思想,不仅因为在概念上,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特指“中外学者在中国大陆用中文发表的讨论翻译的文章或著作”<sup>③</sup>,而且因为在实践中,其文字表述、思想源泉、评析对象、话语方式、文化特质等都“很中国”,涉及训诂学、翻译学、修辞学、对比语言学、文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收稿日期:2023-08-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ZD31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WW003)

作者简介:余承法(1974—),男,湖北安陆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翻译传播学和钱锺书研究。

①余承法:《全译求化机制论——基于钱锺书“化境”译论与译艺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3—17页。

②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③朱志瑜,张旭,黄立波:《中国传统译论文献:主题与分类考察》,《外国语》2019年第2期。

一方面,“化境说”不完全是,或者说不纯粹是中国译论,因为它夹杂西方话语的成分,打上了西方译论的烙印,论及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还多少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的分析对象、阐述内容、借用概念、引用例子等都是典型的以西释中、化西为中。他在文章开篇解释“化境”时,就引用了英国17世纪政治家乔治·萨维尔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并在尾注中提到19世纪德国希腊学大家维拉莫维茨也使用过类似比喻。另一方面,“化境说”的深远影响不限于中国大陆,也扩展到中国港澳台地区,还传播到欧美世界,这表明其思想遗产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全世界。在《七缀集》收录的七篇文章中,《林纾的翻译》是英语世界译介最早(1975年)和最多(10余个译本)、研究也最多的一篇,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林纾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文学史的研究文献较多提及这篇文章和“化境说”。

综上所述,“化境说”是钱氏立足中国本土和本来的文化传统,吸收外来多学科多语种的文献资源,而提出的戛戛独造的翻译学说,既继承了“中学”传统,又发挥了“西学”优长,还体现了钱氏独特的学术风格。

## (二)“化境说”时间界定:传统还是现代

对“化境说”的时间界定,应该是很明确的——属于传统而非现代,但有人依据“现代”“当代”的时间概念,将其归属为中国当代翻译学说或理论。近年不断有人用西方的现当代译论与之进行比较、阐释甚至附会,希望从中找出西方的镜像、现代的因子,更有人断言它是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背离或反叛,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断裂,具有西方现代译论的解构性、现代性和超前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客观、历时和辩证的分析。

1.“化境说”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总体赓续和部分超越

刘靖之<sup>①</sup>、罗新璋<sup>②</sup>认为“化境说”是中国传统译论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一观点得到译学界的普遍响应,但他们大多只下结论而未作分析。有人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的阶段划分,将“化境说”归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如:臧仲伦认为“神似说”和“化境论”是当代中国翻译思想或理论<sup>③</sup>;郑海凌将“化境说”与“神似说”“多元互补说”“优势竞赛论”一起归中国当代翻译学说<sup>④</sup>;马祖毅等将“化境说”与“形似、意似、神似”等一起视为国内现当代翻译理论<sup>⑤</sup>;陈福康完全按照时间划分,将“钱锺书的译学贡献”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中加以评述<sup>⑥</sup>。王宏印指出传统和现代的划分标准是看“译论本身的理论兴趣、理论问题、理论方法、理论形态在本质上是属于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并总结出中国传统译论具有的五点人文精神<sup>⑦</sup>。他采取时间概念加理论属性的分类,认为“化境说”在总体上仍然属于传统译论,时间上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的当代部分,理论上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的直觉阶段<sup>⑧</sup>,但他没有具体分析“化境说”是否以及如何符合这五点。

对照王宏印提出的五点,细读钱氏“化境说”的相关表述及其对林译现象的分析,可以证明“化境说”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第一,“化境说”坚持的传统忠信观、揭示的翻译作为一门艺业的特点显示,它符合“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从业为本的主体性意识”。钱氏特别强调译者需要“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指出研究文学作品可以“不求甚解”,但翻译中“没有一处困难可以支吾扯淡”<sup>⑨</sup>,这就涉及翻译伦理的问题。第二,钱氏对“媒”“诱”“化”“讹”的分析以及跨越30多年阅读林纾翻译

①刘靖之:《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代序)》,载《翻译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4页。

②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续)》,《翻译通讯》(现《中国翻译》)1983年第8期。

③臧仲伦:《中国翻译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④郑海凌:《文学翻译学》,文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83—112页。

⑤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312页。

⑥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7—363页。

⑦此处及以下引用王宏印提出的“五点人文精神”均出自: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⑧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3页。

⑨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6、89页。

之后的反思都表明,他强调的译作功能,即“发挥居间作用”和“缔结姻缘”,反映了“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群体本位思想”。第三,钱氏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关系阐述以及他对林纾作品的评析,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的语言观而不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第四,林纾翻译皆为文学作品的事实,以及钱氏“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的论断,都表明“化境说”涉及的理论话题、分析的文本对象“在材料内容、语言类型和运思方式上都倾向于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而不是科学翻译的科学性”。第五,“化境说”提出的时代背景、文字表述来源和理论渊源、“化”“讹”之间的辩证关系、“失本成译”的观念等,都证明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而非科学的、美学的而非宗教的”。

“化境说”在总体上赓续了中国传统译论,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反传统或超越。钱氏在主张求“信”的同时,流露出求“美”的意识,并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他对林纾翻译中“明知故犯”之“讹”的肯定,被认为是对传统译论的反叛或断裂<sup>①</sup>。“反叛”是可能的、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根本的。鉴于该词带有贬义,不如用“超越”显得积极;“断裂”有点言过其实,毕竟钱氏整体的翻译思想是建基于求“信”的翻译观,“化”“讹”的相克相生和背出分训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避“讹”、求“化”是他长期坚持的翻译主张。

2.“化境说”是对西方理论的部分借鉴和批判吸收

有人指出钱氏对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吸收,或泛泛提及,或列出征引名单,或稍加举例,未作详细论证。更有人借助语文学、符号学、阐释学、描写翻译学等对“化境说”进行现代性解读和申发,认为“化境说”的有些内容已经触及现代译论或者达到当代译学的前沿。黄汉平认为“化境说”体现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sup>②</sup>,但这一观点受到刘全福、陈大亮的质疑。刘全福认为,尽管解构主义对钱氏的诠释方法产生过影响,但解构主义翻译

观与“化境”翻译观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范畴,而且前者在消解后者的同时,也彻底打发了“信”或“忠实”标准<sup>③</sup>。陈大亮既不赞同黄汉平得出“‘化境’是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偏颇结论,又批驳刘全福“解构主义的诠释观与翻译观属于两种不同概念范畴”的草率论断,继而分析钱氏的翻译解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论述意义的不确定性、三种距离的现实性和译文超过原文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化境说”区别于传统理论的地方,其中对“讹”的阐释已达到当代译学的前沿<sup>④</sup>。

我们既不能因“化境说”对传统的所谓“反叛”而否认其中国传统性,也不能因它对西方译论的借鉴与吸收而强调其西方现代性甚至解构性,因为“化境说”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不谋而合更加印证了钱氏的主张——“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sup>⑤</sup>传统相互连接、彼此交织,传统思想是现代学术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学术是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本土学术与西方外来思想虽有时空之隔,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⑥</sup>。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言,“化境说”既是跟着说,更是领着说;对国外语言学、文学与翻译理论而言,“化境说”既是接着说,更是对着说,它坚持“立中融西”的立场,反对盲目地以西释中。因此,“化境说”主要立足中国本土和本来,针对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文学和翻译的现状,适当借鉴和吸收外来,并着眼于未来发展,集传统根基与现代因子于一体,兼顾本土与国外的学术思想,即践行了钱氏一以贯之的“打通”理念。

## 二 “化境说”功能定位:翻译标准还是翻译理想?

《林纾的翻译》是钱锺书《七缀集》中修订最勤、考证最详、经营最善的一篇力作,其中的一处改动最大,即对“化”的界定: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改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这种修改引发了学界旷日持久的争

①崔永禄:《传统的断裂——围绕钱钟书先生“化境”理论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

②黄汉平:《文学翻译“删节”和“增补”原作现象的文化透视——兼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③刘全福:《当“信”与“化境”被消解时——解构主义翻译观质疑》,《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

④陈大亮:《重新认识钱钟书的“化境”理论》,《上海翻译》2006年第4期。

⑤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1页。

⑥钱锺书:《序》,载《谈艺录(补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页。

论:“化境”究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还是最高理想,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 (一)“化境”:最高标准

“化境说”最初是针对中国文学翻译现状和文学翻译标准论争提出来的,相当一部分学人很自然地将“化境”视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有人直接引用《林纾的翻译》早期版本中有关“化”的论述,有时稍加阐发和评析,论证“化”为(最高)翻译标准及指导翻译实践的依据、评价译文的尺度。有人认为“化境”只适用于文学翻译,不宜作为非文学翻译的标准。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学翻译中的科学性和科技翻译中的艺术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更多人认为“化境”也可作为非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

### (二)“化境”:最高理想(境界)

有论者认为“化境”是译者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不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标准。章振群认为“化境说”辩证地继承和升华了“信达雅”,是兼容“形似”和“神似”的文学翻译理想境界<sup>①</sup>。许建平较早注意到钱氏将“最高标准”修改为“最高理想”,认为钱氏并非为文学翻译提出一个标准模式,而是为读者揭示力学的理想境界<sup>②</sup>。葛中俊区分了“翻译的理想”和“理想的翻译”:前者是翻译实践追求的极高限度,是超乎标准以上的目标;后者是应该实现的客观现实,是标准本身。他进而指出,钱氏不为翻译设立标准是因为他意识到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化境”是一个需要追求但无法实现的理想<sup>③</sup>。

### (三)“化境”:最高标准与最高理想之间的通约

也有人认为“化境”是标准还是理想持两可态度。一是模棱两可,不区分“化”是标准或理想,在不同场合甚至同一篇文中采用两种表述,如王宏印写道:“‘化’即‘化境’,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或‘所向往的最高境界’。”<sup>④</sup>二是两者皆可,认为“化”既涉及翻译的性质与定

义,也关联翻译的标准与要求,如余承法指出,“化境”既是译者努力追求的最高理想,又是翻译实践中的最高标准<sup>⑤</sup>,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译者与创作对象、创作艺术之间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sup>⑥</sup>。

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sup>⑦</sup>。标准贯穿翻译活动的始终,准绳聚焦译行,尺度针对译作的质量和规范,原则主要针对译者,目标可大可小、可远可近,远期的的大目标就是译者的努力方向或理想境界。翻译标准归根结底源于翻译的定义,标准和定义是流和源的关系。在翻译范畴二分为全译和变译之后,翻译标准相应地分为全译标准和变译标准。全译是“人或/和机器用乙语转化甲语文化信息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sup>⑧</sup>,其轴心环节是语际转化,包括转换和求“化”,而求“化”是语际转换的核心,体现全译行为的本质属性。钱氏之“化”的本质特征是“去痕、存味”,这正是全译的内在要求。因此,全译求“化”的本质属性、“化”所反映的全译内在要求都表明,“化(境)”是全译标准。

全译标准可以从不同层级考察,也可从读者和译者的视角确定。根据翻译水平的高低,可将译者大致分为五个层级:入门级、中级、高级(前三者可合称为普通级译者)、专家级、大师级,不同层级译者参照不同的全译标准,创作出相应的译本:劣译—普译—佳译—妙译—化译(即“化境”译作)。入门级译者以忠实、通顺为全译的合格标准,以避免劣译、达到可接受的普译为初级目标,以追求化译为最高理想;中级译者以忠实、通顺、准确为全译的基本标准,以立足普译、实现佳译为较高目标,以追求化译为最高理想;高级译者以忠实、通顺、优美为全译的较高标准,以确保佳译、追求妙译为现实目标,以追求化译为理想目标;专家级译者以忠实、通顺、优美为全译的最低标准,以化译为最高标准;大师级译者以妙译为合

①章振群:《论文学翻译“化境”说》,《抚州师专学报》(现《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②许建平:《钱锺书“化境[境]”说新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③葛中俊:《“化境”背后:钱锺书的文本价值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④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83页。

⑤余承法:《全译本质“化”论》,《中国外语》2016年第2期。

⑥余承法:《钱锺书“化境说”考镜源流》,《中国外语》2022年第2期。

⑦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⑧黄忠廉等:《翻译方法论(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格标准,以化译为现实标准和努力终点。“化”作为普通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有助于他们树立长远目标和努力方向,并通过熟能生巧的刻苦训练,最终可能实现“化境”译梦;“化”作为专家级译者的最高标准和大师级译者的现实标准,也是一步步遵循合格标准、基本标准、较高标准、最高标准,将劣译改进为普译,将普译提高为佳译,将佳译锤炼为妙译,最终将妙译升级为化译,普通译者矢志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专家级译者努力实现的最高标准和大师级译者达到的现实标准。“化境”对大多数译者而言,属于可遇不可求的理想境界,但对少数翻译大师而言,则属于最高标准或现实标准。这可能是钱氏将“最高标准”修改为“(可以说是)最高理想”的原因。基于此,笔者赞同杨全红的总结:“‘化境’应该是、抑或首先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但在一定语境下,它也可以是翻译的(最高)标准。”<sup>①</sup>但需要强调的是,“化境”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也适用于非文学翻译,而且就翻译范畴的二分而言,化是全译的本质,“变”是变译的本质。因此,该论断中的“翻译”均应改为“全译”。

总之,钱氏之化属于“并行分训”,兼含全译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成为入门级和中高级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专家级译者实现的最高标准、大师级译者达到的现实标准的通约,体现在入门级、中级、高级译者向专家级和大师级译者的成长蜕变过程中,实现于从劣译、普译、佳译向妙译和化译提升的艺术创作过程中。

### 三 “化境说”范畴定类:翻译观(念)、翻译思想还是翻译理论?

学界对“化境说”的范畴定类大致形成三派观点:观念派、思想派、理论派,主要集中在思想与理论之争。这不仅是在“化境说”范畴上的不一致,而且是对“信达雅”“神似”等其他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理论/话语存在的认识分歧。以中国知网为例,截至2023年10月27日,篇名中含有下列

术语的论文统计如下:“化境”理论(15篇),“化境”思想(7篇);钱锺/钟书翻译思想(30篇),钱锺/钟书翻译理论(11篇);中国翻译理论(116篇),中国翻译(理论/批评/策略)话语(33篇),中国翻译思想(22篇)。这些数据只是就论文标题所作的统计,正文表述或分析中的混淆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但这至少表明了学界使用这些术语时的总体混淆性和个别倾向性。

#### (一)“化境说”:少数人视为翻译观(念)

少数人认为“化境说”是一种翻译观(念)或理念。有人抽象地说起提及“化境”观、“化境”翻译观或钱锺书翻译观,有人分析具体的翻译观类型。如:周领顺一再强调“神似”“化境”是翻译观,不足以构成理论体系<sup>②</sup>;罗选民认为“化境”是文学翻译观,是中国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③</sup>;于德英认为“化境说”体现了钱氏的“人化”翻译观或译文的生命观<sup>④</sup>;葛中俊认为“化境说”是钱氏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他的翻译文本观<sup>⑤</sup>。部分论者虽然将“化境说”视为翻译观,但在标题和正文前后依然混用这三个词语,出现模棱两可或前后不一的情况。“从译便在观翻译,会形成翻译观”<sup>⑥</sup>,翻译观(念)是人们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对翻译逐渐形成的总体看法或基本观点,既包括总体的翻译哲学观、科学观、艺术观,也包括借鉴相邻学科研究翻译时所持的基本观点或原则。相对于翻译思想/理论涉及的更多研究对象和更广研究范围,翻译观具有整体性和聚焦性,主要是指对翻译的观点或看法,直接指导译者的翻译实践,也制约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方法,并最终影响译作质量和接受效果。钱氏对“化境说”的表述,不仅涉及翻译的本质、作用或功能、标准或境界、翻译策略和方法,还扩大到对翻译这门艺业的特点、译者主体性、译作超越原作、翻译与语言、翻译与文体等方面的认识和分析。若将“化境说”仅仅归类于翻译观,势必误解其内涵,窄化其外延,弱化其应有的价值。

①杨全红:《钱锺书译论译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61页。

②周领顺:《“神似”“化境”之辨的译者行为视角——译者行为研究(其八)》,《外国语言文学》2011年第4期。

③罗选民:《论钱锺书的文学翻译观》,《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2015年第1期。

④于德英:《翻译之喻的历史化:钱锺书的“人化”译文观》,《外语研究》2019年第3期。

⑤葛中俊:《“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锺书的翻译文本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⑥黄忠廉,傅艾:《观翻译与翻译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 (二)“化境说”:多数人争辩究竟为翻译思想还是翻译理论

刘靖之、罗新璋在20世纪80年代将“化境说”归为翻译理论,得到很多学人的响应。这些人习惯并举使用“理论”与“实践”,如:钱锺书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化境”理论与实践。有人不区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在不同场合将“化境(说)”表述为翻译思想、翻译观、翻译理论,有时也使用“翻译论述”和“翻译话语”。另有人注意到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差异,明确指出“化境说”属于翻译思想而非翻译理论。

其一,我们需要区分这两个概念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翻译思想指“翻译家对翻译之‘道’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表现为对译事的某种原则主张或基本理念,通常经历三个深化(或提升)阶段:体验、体认、体悟;翻译理论是“从实践概括出来的相关知识的系统性结论以及对与翻译有关的现象或本质所作的系统性描写或阐释,是对该学科的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sup>①</sup>。由这两个定义可知:翻译思想具有片段化、零碎化和单一性等特征,而翻译理论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多元性等特征;翻译思想的外延更大,范围更广,而翻译理论的内涵更丰,更加理性化、体系化。换言之,并非所有翻译思想都可成为翻译理论,但翻译理论是系统化的翻译思想;翻译思想是翻译理论形成的基础和前提,翻译理论是翻译思想的升华和体系化。黄忠廉认为,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从翻译思想到翻译理论必须经过一系列过程:产生感性认识→确立翻译思想→验证翻译假说→形成翻译理论<sup>②</sup>。根据这些界定和分析,结合“化境说”的时代背景、相关概念表述、林译作品评析可知,“化境说”具有模糊性和传承性,缺乏严密推理和逻辑体系,只能定位于翻译思想而非翻译理论。

其二,我们不仅需要“以钱解钱”,更需要“以钱证钱”,聆听他本人对理论和思想的想法。事实上,他在《读〈拉奥孔〉》一文的开篇就对有人迷信理论著作表达了不满:“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sup>③</sup>“常”表明人们对理论系统的信奉是自

古有之,是一种常态和惯性;“垄断”强调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名牌的理论著作”对知识演进和学术传播的把持。理论著作的长期垄断与人们对理论系统的惯常痴迷交相呼应,导致学术发展中的恶性循环——仰慕名人大家,看重名牌佳作,追求系统理论。他接着明确思想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强调“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自发的孤单见解”即思想,包括“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具有自发性、偶见性、零碎性、片段性;理论是自觉的“严密周全的思想”,具有自觉性、周密性、系统性、整体性。他最后对重视理论而忽视思想的做法表达了不屑:“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钱氏不追求建构鸿篇巨制的系统理论,因为它们“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而“在整体上都垮掉了”,却看重片段思想,因为它们“说出了精辟的见解”,“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去时效”。由此可见,钱氏作为片段思想而非系统理论的主张者和践行者,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学术实践中往往采取一种非体系的方式,使得其学术思想呈现一种零散、自发、片段的外貌。他坚信“诗词、随笔、小说、戏曲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他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标举的“化境说”就是他从《说文解字》、南唐以来小学家的诂林、外国学者的书信和译稿中揭示的重要翻译思想。

## 结论

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只用了70多字界定“化境”,没有详论“诱”“媒”“讹”“化”之间的关系,而是将更多笔墨用于分析林译现象,但“化境说”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被不断称引、阐发、评析和运用,成为中国传统译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境说”研究中存在的“十多十少”不平衡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时空定界不

<sup>①</sup>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

<sup>②</sup>黄忠廉:《严复变译思想考》,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页。

<sup>③</sup>钱锺书:《读〈拉奥孔〉》,载《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34页。以下引文均来自同一出处,引文之外的内容均为笔者的解读。

清、功能定位不准、范畴定类不当等现状,需要进行全面、理性、辩证的分析。时空界定上,“化境说”以传统为主,兼含现代因子,以本土为本位、西方为参照,是钱氏打通古今、中西、学科的思想结晶。功能定位上,“化境说”是入门级和中高级译者追求的最高理想,是专家级和大师级译者达到的最高标准,是全译最高理想与最高标准的通约。范畴定类上,“化境说”是钱氏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文学翻译事业高涨、翻译标准争论增多,并结合对林译现象的重评,而萌发的片段翻译思想,是其翻译(主要是全译)思想的集大成与核心,并非他刻意建构的翻译理论体系。“化境说”的这“三定”,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涵和实质,澄清认识误区,推动钱氏翻译话语的体系形成和理论建构,实现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Qian Zhongshu's "Thought of Sublimity": Demarcation, Orient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YU Chengfa<sup>1</sup> & LIANG Qiwan<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disagreement on Qian Zhongshu's "Thought of Sublimity" (hereinafter abbreviated as "TS"), such methods as close reading, interpreting Qian in his words,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re adopted to reinterpret the translation thought. In terms of spatial-chronological demarcation, TS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bsorbs modern western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thus being the quintessence of Qian's scholarly philosophy of strik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and West as well as various disciplines. In terms of orientation for its function, TS is average translators' pursuit of the highest ideal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experts and masters' realization of the highest standard, hence the 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the highest ideal and highest standard. In terms of categorization, TS is Qian's fragmentary translation thought, which was aimed at reappraising Lin Shu's translations and conceived from Qian's own translation experiences, rather than his intentional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S helps to provide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its connotation and nature and carry forward Qian's translation thought so as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Thought of Sublimity"; demarcation; orientation; categoriz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